宋庆龄与对华国际援助（1942 年 9 月-1946 年 6 月）

——探寻《美国援华联合会新闻》英文月刊中的历史见证

朱贤皛

《知识经济》2018 年 23 期

摘要：本文对 1942 年 9 月至 1946 年 6 月期间，美国援华联合会[1]出版的全部《美国援华联合会新闻》英文月刊[2]进行了整理，并将其中引述宋庆龄先生与美国援华会[3]互动电文、信件的全部报道进行了翻译和梳理，力求补充宋庆龄先生与美援会合作互动的相关中文文献，以为进一步研究参考。

关键词：宋庆龄书信 美国援华会 《美国援华联合会新闻月刊》

本文对 1942 年 9 月至 1946 年 6 月期间，UCR 出版的全部《新闻》月刊进行了整理。从中发现引述宋庆龄先生电文、信件的报道共计 12 篇，明确提及宋庆龄先生生平、事业的图文报道共计 17 篇。虽然这些原始报道中的绝大多数，在已发表的中文文献中鲜见其踪，但是这部分内容对于研究宋庆龄先生在这一时期如何与 UCR 保持密切联系，并籍此进一步探讨她如何向国际社会反映真实中国状况、呼吁向游击区提供公平援助等史实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本文对其中引述宋庆龄先生电文、信件的全部英文报道进行了翻译和梳理，力求弥补在同一研究主题下，现有中文文献的内容不足，以为进一步研究参考。由于月刊中其它涉及宋庆龄先生生平介绍和救济事业的相关报道内容已为周知或涉及本文主旨不多，在此仅择其要而选译。

《新闻》月刊创刊于 1942 年 9 月 5 日。至 1946 年 6 月，共出版了 5 卷 46 期。在此期间，宋庆龄先生与 UCR 的下属合作机构美援会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宋庆龄先生的许多救济事业争取到了美援会的资金、物质支持[4]。由于项目需要，宋庆龄先生经常就项目实施情况和国内实际需求向美援会致电呼吁，美援会也有专员与宋庆龄先生保持联系、来华考察。这些原始电文由于年代久远和战争原因，现在难得一见，所幸从这套月刊所载报道中，可窥一斑。

宋庆龄先生在 1941 年 12 月撤离香港后，旋即于重庆重新设立保卫中国同盟

---

[1] United China Relief，下称“UCR”。

[2] News of United China Relief, 下称“《新闻》月刊”或“月刊”。本文所参考的这份月刊合集收录了 1942 年 9 月创刊至 1946 年 6 月出版的全部期刊。

[3] China Aid Council，下称“美援会”。

[4] Wide range of projects included in program of China Aid Council [N]. News of United China Relief, 1945-06, Volume4, No.6(5); C.A.C. sends big sum to China’s children [N]. News of United China Relief, 1943-12-04, Volume2, No.12(5).

（下称“保盟”）总部。至迟在 1942 年 9 月的首期月刊出版前，她就以保盟主席的身份与美援会取得了联系。在首期月刊中，题为《救济基金抵达游击区》[1]的报道就引用了她向美援会发送的电文，报告称“现在能够为国际和平医院及其它在中国西北部游击区开展的救济项目转帐 ‘不受限制的基金’。” 重新建立联系后，1942 年下半年到 1943 年底的月刊中频频出现宋庆龄先生与美援会就国际援助和具体救济实施情况互动的电文、信件，其中援助资金的具体使用细节和中国人民在恶劣条件下始终坚持自救的英勇事迹也经由月刊报道传播给热心中国局势的海内外读者。

1942 年 12 月的期刊中，《药厂令游击区免除灾难》[2]一文报道了 1938 年起美援会所帮助建立、资助的西北药厂生产天花疫苗的情况。文章援引宋庆龄先生致美援会的报告：“该药厂自建成以来所生产的血清制品，使这个原被称为‘瘟疫带’的整个地区不再爆发伤寒、白喉等流行病。”这个西北药厂制造的许多药品都是以当地的中草药为原料，供给四个国际和平医院。药厂的实验室还尝试制造进口药的替代品。

1943 年 2 月，在《孙夫人感谢联合会捐赠》[3]的报道中，宋庆龄先生以保盟主席的身份致信国际皮革工人联合会主席本.高德[4]，感谢他通过美援会捐赠的 7500 美元。宋庆龄先生将这笔捐款誉为“反法西斯前线的一方人民向另一方人民所伸出的充满温情致意和支持的手”，它将被用于白求恩所创立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建设新翼，其第一年的手术费用也将得到资助。

1943 年 4 月，题为《医生和护士成为种植自己药品的农民》[5]一文中，刊登了宋庆龄先生致美援会电文的主要内容，她紧急呼吁提供紫色毛地黄、颠茄植物的种植方法：前者的叶子可以用于制造洋地黄，后者的叶子可以生产颠茄类药物。她还报告了研究进度：现在从鸦片中提取到了少量可待因和吗啡，这些在战斗前线都是必须的药品。宋庆龄写道，1937 年日军侵华以来，游击区的战斗从未停止，这里的许多战士已经牺牲了，但更多的伤病员还在不必要地忍受着西北地区的药物短缺。为了自救，这个药厂的化学家正在改良从当地油田里提取的低品质凡士林。在同期月刊中，还另有一段介绍中国经济情况的简讯——《生活成本》[6]，其中提到了宋庆龄先生致美援会的信件，她称当时中国的生活成本已经是美国的 5 至 8 倍。

1943 年 5 月，《中国的饥荒助长日寇进兵》[7]一文中提到宋庆龄先生在给美援会的电文中认为，1943 年河南、山西的饥荒恰恰给了日军进兵以可乘之机，她呼吁为河南、山西提供额外的援助以救济和稳定那里的人民生活：“利用饥荒所

---

[1] Relief funds reach guerrilla war areas [N]. News of United China Relief, 1942-09-05, Volume1, No.1(8).
[2] Guerrilla factory averts scourge [N]. News of United China Relief, 1942-12-05, Volume1, No.4(5).
[3] Mme. Sun thanks Union for its gift [N]. News of United China Relief, 1943-02-06, Volume2, No.2(6).
[4] 本.高德（Ben Gold），时任国际皮革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Fur and Leather Workers' Union)主席。
[5] Doctors and nurses become farmers to grow own drugs [N]. News of United China Relief, 1943-04-10, Volume2, No.4(7).
[6] Cost of living [N], News of United China Relief, 1943-04-10, Volume2, No.4(7).
[7] Famine in China helps Jap advance [N], News of United China Relief, 1943-05-10, Volume2, No.5(5).

造成的不利条件，日本人正在逼近目前仍由我方控制的战略点。在这个时候，增加救助将避免这个地区大幅度的人口减少，并且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这无异于将了日本人一军。不仅是对中国而言，这些忧患对联合国的事业来说也同样是种危险。”她表示，目前救济项目仍未惠泽千万受灾家庭。

1943 年 9 月，《日寇迫使和平医院一年三迁》[1]的报道引述了宋庆龄先生的报告，透露当时日军逼近给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造成了的很大困难：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彼时已经迁至河北，在砖土砌成的农家小屋里工作，而河北在名义上已沦为日占区。

1943 年 11 月，《大批药品运抵西北地区医院》[2]一文报道，宋庆龄先生致电美援会，告知 42 箱西药和医疗设备，包括显微镜等，已经运抵中国游击区的国际和平医院。这是三年多来这一地区获得的第一批援助，来源于美国红十字会。而该地区原有的西药已在一年多前耗尽。由于缺乏医药物资，游击区医生用木制牵引器代替眼科手术中已经破损的金属仪器，以竹钳代替了铁钳，他们还尝试培植制造西药的植物，用大米生产酒精，以当地提炼的油制造凡士林，在鸦片中提取可待因和吗啡。在当地最受欢迎的是一小部分磺胺类药品和微胶读取器（提供最新医学数据）。美援会正在设法提供急需的微胶文本和最新的医学信息，以供国际和平医院附属的医学培训学校使用。

在之后一期月刊的报道中,题为《洪水、饥荒威胁中国西北前线》[3]的文章称，由于河南的洪水和饥荒所造成的人口减少，使中国重要的西北前线面临士气下降的危险。宋庆龄先生就此事给美援会的电文中指出，在游击区开展饥荒救济工作是对努力抗战的直接贡献，因为一个人口锐减的乡村将加速敌军的入侵。她向美援会申请了 10 万美元来向受饥荒的群众提供食物和住所。根据宋庆龄先生的电文，河南有 29 个受灾区属于游击区管辖，当局正在作“富有英雄气概的努力”来挽救人民生命、免其受背井离乡之苦，否则由此而造成的真空地带将使敌军能够轻而易举地长驱直入。

宋庆龄先生与美援会之间的通信在一年之内多次出现在月刊的报道中。这些内容既反映出宋庆龄先生对抗日局势的至为关切，也如实反映了我们获得的每一笔国际援助使用情况始终为国际社会所关注——这样的通信与报道切实加深了双方的了解与友谊，成为彼此进一步密切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在艰苦的条件下，中国人民不放弃自救、坚持抗战的决心也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尊重和支持：从美援会的相应救济举措中不难推断，他们也在不断地动员资金、实物和科学技术上的援助以帮助中国抗战；这些报道得以发布，本身就折射出 UCR 对中国抗战在道义上的响应、支持，以及对宋庆龄先生及其领导下的保盟救济事业的充分肯定。

---

[1] Japs force peace hospital to move thrice in year [N]. News of United China Relief, 1943-09-04, Volume2, No.9(6).
[2] Big drug shipment gets to northwest hospitals[N]. News of United China Relief, 1943-11-06, Volume2, No.11(3).
[3] Floods, famine threaten China’s northwest front [N]. News of United China Relief, 1943-12-04, Volume2, No.12(3).

1944 年 8 月，一篇简讯——《游击区的孩子将拥有美妙的 1944》[1]中又出现了宋庆龄先生的来信。她提到，游击区所有的孩子都在迫切盼望这里的糖果生产计划。游击区上一年度播种了甜菜种子，当年又复种了一些，下一年度，这些农作物将被用于糖果生产。虽然许多中国西北部游击区的“战争孩童”从未尝过糖果，但是下一年度，他们应得到这样巨大好处。据文章介绍，宋庆龄在游击区资助了 21 所日间临时托儿所，这些项目也为美援会所支持。同一期刊的另一篇简讯—— 《急需 X 光胶片》[2]一文中透露了游击区的国际和平医院 X 光胶片告罄的消息。宋庆龄先生就此事给美援会写信，告知游击区唯一一台 X 光机没有发电的装置，医院不得不向附近的重工业工厂去借。由于没有胶片，当时只有荧光检查可以做，然而如果 X 光电子管坏了的话，甚至连这项服务也只得终止。并且此时已没有任何替代设备。

抗战胜利后，月刊的报道仍然关注着宋庆龄先生的事业。1946 年 3 月，《孙中山夫人敦促向中国北方继续提供援助》[3]的报道中转述了宋庆龄先生致美援会的信件，对中国北方游击区在基本上与外部世界隔绝的情况下，所创造的治愈伤员的奇迹表示赞许。宋庆龄先生向在战争年代给予游击区持续医疗救济援助的外国友人表示感谢，并呼吁进一步的支持：“国际援助将更为自由地流动，障碍已不复存在。拓展我们医疗工作的热情从未磨灭，现在，我们要求持续性的进一步援助。目前，国际和平医院盘尼西林的使用得到了发展，移动卫生站正承载着卫生、疫苗和母婴保健的宣传课程惠及中国的边远地区。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已经可以将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建立覆盖公共卫生的项目。请帮助我们加强医药学校和药厂的作用。请帮助我们的人民享有医疗。”

为了更好地开展援华工作，UCR 也邀请宋庆龄先生出任其重庆委员会的重要职务[4]，并出版了宣传宋庆龄先生所开展的救助项目的小册子——这些项目也在 UCR 支持救济项目之列[5]。此外，月刊中还报道了一些有关国民党内选举宋庆龄先生担任有关职务的消息[6]。

宋庆龄先生自 1915 年与孙中山先生结为革命伴侣后，一直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和助手。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先生秉持他所提出的教育与政治哲学，一直担当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的“正式解读者”，她“总是毫无畏惧”[7]。宋庆龄先生通过与美援会的友好互动，不仅为我们的游击区争取到了宝贵的国际援助、为广大游击区军民谋幸福、为国际社会了解真正的战时中国提供

---

[1] Guerrilla babies to have big 1944 [N]. News of United China Relief, 1943-08-07, Volume2, No.8(3).
[2] Need x-ray films [N]. News of United China Relief, 1943-08-07, Volume2, No.8(6).
[3] Continued aid to north China urged by Mme. Sun Yat-sen [N]. News of United China Relief, 1946-03, Volume5, No. 3[2].
[4] UCR establishes two key groups [N]. News of United China Relief, 1942-11-07, Volume1, No.3(1).
[5] China Aid Council tells of children in brochure [N]. News of United China Relief, 1942-11-07, Volume1, No.3(2); UCR publishes two factual pamphlets [N]. News of United China Relief, 1943-11-06, Volume2, No.11(5).
[6] Soong sisters elected [N]. News of United China Relief, 1945-06, Volume4, No.6(6); Mme. Sun on committee [N]. News of United China Relief, 1946-04, Volume5, No. 4[3].
[7] Widow of Sun Yat-sen perpetuates his beliefs[N]. News of United China Relief, 1943-10-02, Volume2, No.10[8].

渠道，她更以全部的热情和能量，为中国大声疾呼，争取公正的国际地位和公平权益。她明确指出抗战之于中国、之于美国乃至于整个世界的意义，促使抗击日寇逐步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共识和努力。

遗憾的是，本文利用这一时期的月刊所整理的相关内容，只可见当时宋庆龄先生所发出的诸多书信的冰山一角，所列多数报道也仅引用了原文的片段或者转述。并且，由于原始资料的限制，这套合集仅收录了 1942 年 9 月至 1946 年 6 月的全部期刊，对此后的刊物未有涉及。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本文所列报道中所反映出的当时中国抗战的一手资讯和游击区救援实施细节，得以报道形式公诸于众，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宋庆龄先生与美援会的密切互动（包括电文、书信和人员往来等）。即使是在今天，我们仍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宋庆龄先生在动荡的战争岁月里执着信念、坚定信心，无畏而无私地持续斗争和奉献！

本文完成之际正值宋庆龄先生诞辰 125 周年、中福会成立 80 周年，谨以此文向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二十世纪伟大女性,致以崇高敬意！